



MAKESI ZHUYI YISHI XINGTAI
JIAN SHE DE
JICHU WENTI TANYOU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基础问题探幽

陈冬生 王枫桥 著

人民出版社

MAKESI ZHUYI YISHI XINGTAI
JIANSHI DE
JICHU WENTI TANYOU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基础问题探幽

陈冬生 王枫桥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问题探幽 / 陈冬生，王枫桥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01-021522-8

I. ①马…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IV. ①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6942 号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问题探幽

MAKESI ZHUYI YISHI XINGTAI JIANSHE DE JICHU WENTI TANYOU

陈冬生 王枫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21522-8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发生和生效的总体性场域	18
一、认识客体的对象性演进	21
二、现实宏观世界之外	26
三、认识客体对象性演进之总体性场域的本质	33
第二章 “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前提	42
一、“视域”概念简史	44
二、“视域”是什么	51
三、“生动直观”的视域	56
四、“抽象思维”的视域	61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发生	66
一、唯物史观视域	67
二、唯物史观关键词谱系的确定性视域	76
三、唯物史观关键词谱系的非确定性视域	95
四、在唯物史观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两大视域之间	112

第四章 意识形态的生效 123

 一、精神产品的一般特征 123

 二、“意义”的意义 136

 三、“意义”的“定向” 145

第五章 面向确定性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61

 一、面向确定性的哲学根基 162

 二、面向确定性的实践历程 170

 三、面向确定性的经验教训 187

第六章 面向非确定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198

 一、面向非确定性的思想溯源 199

 二、面向非确定性的相继与分析 218

第七章 贯通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 259

 一、贯通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历史进程 260

 二、贯通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新举措 274

 三、基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291

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32

导 论

《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到如今已经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诗意地栖息于天理—人情—法度之中，桥接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恰如北宋理学大师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②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③，“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④，新时代，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⑤。

毋庸置疑，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与核心就是

①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意义，明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逐步进入学术视野。就“建设”而言，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和特性，其“观念上层建筑”之隐喻在后来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便催生了“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从应然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来，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实践进程中去，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实然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多元开放条件下屡遭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直接威胁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从应然与实然相结合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从理论切入实践，才能在思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斩获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古语云：“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①面对“现实”的不利锋芒，只有坚定立场、三省吾身，方可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之“柔”以克现实挑战之“刚”，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基础理论构建的意义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时，马克思强调：“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并称之为“意识的（这种）限制”^②。这警示我们：务必清醒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只有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① 《心书》将刚第九。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建设的科学认识，才能在总体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才能在总体上保证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在根本上保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在根本上保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不断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体制机制，才能在战略上保证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才能在战略上构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深广理论背景、历史经验教训和尖锐现实问题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具有政治、学术和应用三方面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恰逢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因素和重大风险陡增——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强力冲击和阻碍，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的情感“焦虑”……面对“焦虑”，只有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认识，才能坚持、发展和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优势，不断增进其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进而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整合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成果，才能顺应马克思主义从“解释”世界走向“改造”世界的大势，才能使其不断得到补充、完善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代转型，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根本目标在于，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规律。只有探明和把握这一本质规律，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指导作用，进而明确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战略，提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在学科中复明、在教材中显身、在论坛上发声，为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是关系到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应对国外思潮的影响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现实实践对策问题。在开放条件下，无论是正常的政治转型还是非正常的政治动乱大都与国外思潮的影响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外思潮纷至沓来，国内思潮激烈交锋，争夺话语权、主导权和合法性，虽能启发人们解放思想促进改革，但引导不好也可能引起思想混乱，甚至触发政治动乱乃至所谓的“颜色革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有利于准确把握各种国外思潮的不同影响，增强我们对正面影响的辨别力和对负面影响的免疫力，有利于在思想文化多元化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梳理国内各种思潮与国外思潮的理论渊源关系，有利于澄清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是非问题，进而“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①。总结应对国外思潮影响、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维护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顺应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针政策和方法。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②“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③，提供学理支撑，正确引领社会思潮。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0页。

二、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现状述评

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多元价值追求的交锋外在表现为“是什么”的缺席、“为什么”的冲突和“怎么样”的茫然，各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挑战。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会也没有在现实交锋中失语，一直在以其博大的理论胸怀和精深的思想内涵直面现实，努力在新时代为“现实的人”的“解放”指明航程。

国外相关研究分右翼和左翼两大对立板块，欧美国家的少数学者重点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等，涉及的论题范围较窄；一般不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个概念，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

西方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从“意识形态终结论”到“普世价值论”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至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帕累托、丹尼尔·贝尔以及诺斯等学术名流，以文化、文明及其他概念涵盖、替代或贬义化意识形态，延续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达到了巅峰。帕森斯认为现代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出现在法国的唯心主义历史循环论；二是在英美占优势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三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超越这三种意识形态”归功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潮，经过涂尔干等人的推动，到韦伯形成了“价值中立性”学说。赖克和帕累托还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意识形态现象进行了分析，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作者曼海姆则被公认为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代表。盖格尔明确主张把意识形态作为认识批判的概念，使之理论化、认识论化，完全脱离阶级和党派利益。阿隆、希尔斯在 1955 年“争取文化自由大会”上提出了

“意识形态的终结论”，经由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利普塞特的《政治的人》等著述，形成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潮。应用模式化研究方面，国外中国问题专家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加以模式化研究，如派伊《中国的政治动力学》的现代化模式、毛里和子《现代中国政治》的方法论模式、舒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的倾向模式等。

西方左翼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倾向。倾向一：依托“宏大的叙事结构”，不是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某种经济决定论，就是一味谴责“苏联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化为教条，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广受责难。倾向二：基于文化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化霸权，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所谓的微观视域，虽在诸多场域内构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但“机制”从未形成，只因其不慎跌入“结构”与“解构”间的鸿沟而无法自拔。倾向三：后马克思主义突出“接合式”话语理论，引领了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新兴的“马克思学”则从文本上制造了“两个马克思”的概念冲突、价值冲突、方法冲突以及功能冲突，把马克思主义肢解成为碎片化的意识形态理论。

知识背景、历史文化和政治立场的相异，导致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难以形成清晰的统一的理解模式，关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在提供了现代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经验，提示我们要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内含复杂的思想性前提、深广的历史性背景以及普遍的实践性难题。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研究依托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资源，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研究面趋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的研究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

来，论著数量飙升。学界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和依据、意义和内涵、原则和要求、重点和难点、经验教训和规律、方法和载体、政策和策略、历史轨迹和路径依赖以及趋势走向，还包括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关系，特别是与文化体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尤其还有与大众文化和政党文化的关系，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方略和原则，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不同观点：诸如价值观念导向说、道德规范取向说、意识形态功能激发说、上层建筑反作用说等。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归纳为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功能；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归纳为预测、调控、教育与整合功能，大多主张从多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

就现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界主要取得了三点共识：第一，已经意识到第二国际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的一般学说，是使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等同的理论陷阱；第二，坚持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区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认同再到高度重视的曲折过程，已经把它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话语系统，并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应用对策研究居多。诸如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难点问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全球化思潮中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研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研究、党的意识形态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方式研究……政治原则越来越明确，从“一元”“二为”“三双”“四以”到“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再到文化自信；学理阐释越来越有广度和深度，应用对策越来越对症下药，基本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的一元指导下多元化并存、多样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主流媒体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思潮对高校师生的影响两个方面。同时，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战略决策，学界围绕“引领”和“掌握”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言盈庭，其中不乏学术名流和政界精英：一方面，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和实践特色；另一方面，也集中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和误判。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对现象研究精细而对本质规律研究不够、单项性研究多而整合性研究不够。国外相关研究的右翼部分，除了诺斯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关于意识形态的界定属于中性阐释外，其他大多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外相关研究的左翼部分，大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失之偏颇——不但存在学术精细化而思想简单化倾向，而且存在着模式化推理、简单化类比、现象性比附和碎片化创新等问题，往往在概念演绎中与现实渐行渐远。

——现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结构的阐释缺乏充足的学理化支撑。一方面，学理研究显得不够。如从学理上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质、内涵、关系、历史进程、经验教训、基本规律等，显得不足。另一方面，从学理深度研究显得不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我国理论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角度研究较多，从哲学层面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致使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

研究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解释框架的构建缺乏周详的经验性考辨。中国传统学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等，本来都可以作为新问题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研究缺乏多学科大视野，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整合研究也被严重忽视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意识形态建设诸多有益经验的吸取，忽视对中国历史上关于教化民众诸多有益成果的弘扬，忽视对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关于意识形态宣传诸多有益成果的借鉴，则必然致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在循环论证的基础上陷入空洞的解释。

深究和慎思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规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方法论角度看，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关键是要将文本依据与思想内涵、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整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以多学科大视野为基础的学理化逻辑结构、经验性解释框架和政策性选择方案。学理化的逻辑结构来源于文本依据与思想内涵的统一，也即在文本扩充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思想对文本的再解读；在文本与思想碰撞的过程中获取以研究对象特殊性为基础的功用效能——也即“本质功能”，蕴含在其中的逻辑结构便以学理化的形式展现，帮助我们回溯历史中的现实，并直接为选择方案在前提角度提供有历史底蕴的可行性论证。经验性的解释框架来源于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的统一。历史的诸种因素造就了今天的“历史合力”。历史地看待历史才能在现实立场上看待历史得到的有益的经验。经验的积累总结又为解释现实提供框架，解释框架历经实践的淘洗而不断靠近真理，这便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

一,“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①是二者统一的基础,其间蕴含着可整合的因素,在异与同交锋的过程中获取整合历史与现实的利器——也即“比较—整合”。它贯通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以比较呼应本质功能,使学理经由历史化为现实;以整合启迪选择,使历史经由现实化为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基础 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框架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根本任务,我们所确定的主要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性问题”。在学科发展进程中,“整合”与“分化”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分化”指的是将现有研究社会、历史、人类发展基本规律的学科详细分出数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而“整合”指的是学科间的交融、影响和协调而形成的大视野综合性学科。从哲学角度看,“整合”作为以“联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为基础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其意义在于主体以整合的视角切入客体的各个要素,通过某种方法使各要素彼此链接,使客体各要素在系统性和协同性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整体性。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而言,“整合性问题”起因于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已有研究成果的缺陷性。长久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乃至心理学的重点议题,各国各流派各专家的观点莫衷一是,开放条件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形成巨大冲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十分突出,单靠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填鸭式”灌输难以应对复杂局面,只有以“海纳百川”之势将其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加以整合,在现实中发微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理性的逻辑结构、经验性的解释框架和政策性的选择

^①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3页。

方案，以应对复杂的斗争形势，真正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坚定文化自信。

毛泽东说：“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方法问题，首要的基本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但就“整合性问题”的基本特征来看，势必牵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做到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在于“不一定甚至不必‘言必称马’，但一定是行必依、事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②。与此同时，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立足本国实际、回答现实问题、促进思想创新，就必须推动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必须在基础理论构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创新研究方法和框架思路。

（一）主要方法

1. 基础理论构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相结合

在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理论构建研究揭示研究对象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实践应用研究直接指向基础研究成果的现实运作效果和主体体验，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实践应用研究对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决定作用，是基础理论研究问题的来源，是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的现实动力，还是检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场域；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也影响应用研究，反作用于应用研究，正确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对应用研究有巨大的指导作用，错误的不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则会把应用研究引向误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能只在“学院”中“自圆其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② 何毅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学习时报》2017年5月22日，第1版。

说”，必须将其与应用研究统一起来，在应用中寻找问题，在应用中获得动力，在应用中检验理论成果正确与否。

2.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是指在应然逻辑框架中演绎研究对象运动、变化、发展全过程的研究方法，它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并由此确立相关原则作为“定性”依据，旨在从辩证逻辑洞穿普遍性与特殊性。实证分析是指在实然逻辑框架中检验关于研究对象的前提性假定、观点等，它以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为前提，由此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依据大前提和小前提、从显而易见的客观现象导出“科学判断”，偏爱定量分析，旨在形式逻辑揭示事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不能抛开研究对象的实际内容和客观矛盾，只注重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有限形式，因而以永恒的前提性的形式出发，固化思维进路，这样一来，最终只能得到有形无实的研究结论。所以，研究者必须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区别与联系统一起来，使得理论拥有完整的形式和内涵。那么，一方面，没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判断就没有实证分析的逻辑推演，规范分析是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实证分析要贯穿特殊性与普遍性，其遵循的所谓逻辑原则也正是贯穿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往往是由规范分析得出的。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为规范分析提供现实指导，规范分析要洞穿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对客观现实进行规范分析的指导性原则，则是实证分析对客观现实逻辑推演的结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只有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在对各种不同意识形态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明晰其理论生成和演进路径，才能在各种意识形态产生发展的特殊性现实中获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普遍性真理。

3. 定性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中的“性”就是哲学中的“质”，作为一种内在规定性使